

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宣传工作述论

张牧云

【摘要】在皖南事变善后阶段,随着美国政府态度的逐渐明晰,中共认为加强对美国的宣传工作是给予国民党方面压力的重要方式。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新闻的压制封锁,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与跨国记者群体成为中共沟通内外的新闻中转站,及时向美国新闻界传递信息。中共对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人民之友社、保卫中国同盟与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等国际民间组织及美国华侨团体开展统战工作,增强中共的国际舆论影响力。一方面,事变后中共在重庆、香港与美国三地集中开展的对美宣传工作使中共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形象在美国政府和民众的视野中得以强化;另一方面,中共认识到在外交上,尤其在对英美外交上“大有活动余地”。

【关键词】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国际统一战线

【作者简介】张牧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京),2023.第10辑.39~54

【基金项目】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研究”(项目号:22KDC009)阶段性成果。

争取国际舆论与国际援助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开展统战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随着对国际宣传工作的重视,中共在抗战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张明暗交织的对美国统战的国际宣传网。舆论的背后是具体的人和组织。通过皖南事变后的国际舆论,我们可以勾画出中共对美国统战的国际宣传网络,探知这一网络的深度与广度。学术界关于皖南事变后的中共国际宣传问题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中共以重庆南方局为基地,主动发起国际宣传攻势,批评国民党制造国共摩擦、枪口对内的行径,并表明中共的抗战主张;第二,中共的国际宣传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推动美国政府对国共关系的直接干预。^①

不过,目前关于皖南事变后国际舆论的中英文报刊资料仍有待进一步梳理,事变后中共开展对美国宣传工作的研究也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例如,

中共海外宣传机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与美国的中英文报刊如何形成内外互动关系?再如,事变后,国际民间组织与美国华侨团体如中国人民之友社、太平洋国际学会、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何以在其相关刊物连续发声支持中共?中共如何与美国社会各阶层建立联系,甚至影响美国政府?基于美国埃默里大学菲利普·贾菲档案(Philip J. Jaffe Papers),以及《今日中国》(*China Today*)、《美亚》杂志(*Amerasia*)、《美洲华侨日报》、《远东通讯》(*Far Eastern Survey*)等报刊资料,本文试图从跨国视角出发,探讨中共组织对美宣传网络的具体过程。

一、事变后中共加强对美国宣传工作的背景

皖南事变后,国共双方剑拔弩张,中共党内对于“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准备全面反攻”以及“英美对事变的态度”两个问题的认识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在

军事上准备对国民党全面大反攻“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②因此刘少奇提出“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暂不反攻”的建议,希望“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破国民党分裂行为,以孤立顽固派,并在全国造成我实行军事反攻之理由”。^③

1月17日,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这使毛泽东判断全国性破裂已经开始,认为“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决裂”,因此需要在政治、军事上皆做好反攻准备。此外,毛泽东猜测:“国民党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义[意]。”^④1月18日的《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皖南事变即是三国同盟以来国民党内亲日派、英美派同谋的一连串反共事变的继续发展”。^⑤

1月25日,毛泽东在考量形势的发展以及苏联方面的建议后,对“在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问题改变态度,向周恩来发出“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指示。毛泽东指出,“延安命令及谈话已直发中央社、蒋介石、香港、上海及各地”,“蒋一月十七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一月十七号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⑥毛泽东的电文标志着中共开始决心从政治舆论而不是军事上反击国民党。

经过中共一段时间的政治宣传攻势,尤其是国际舆论宣传,英美方面对皖南事变的态度逐渐明晰。2月13日,任弼时在总结事变后英美方面态度时指出:“英美帝国主义对于蒋介石和顽固派采取‘限共’、‘反共’的政策是赞成的,但对于这次消灭皖南新四军,宣布新四军为‘叛变’,取消其番号,也认为这种干法可能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而不能达到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除少数的外交官员和某些反动的外国记者赞成国民党这种干法外,大多数的外国人,认为这次事件要直接影响中国抗

战的前途。许多英美人士,要求其本国政府注意这一事件的发展,并给中国当局以压力,以免事件的继续扩大。”^⑦2月17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等的电文中指出英美不支持国民党扩大“剿共”进攻:“日蒋没有妥协以前,蒋大举对我进攻是不可能的。第一他没有便利战场,第二政治上不好动员,第三英美都不赞成,第四蒋桂已有矛盾。”^⑧

2月14日,周恩来与罗斯福特使居里就皖南事变问题举行会晤,周恩来向居里提供皖南事变真相的若干材料。会谈后居里向蒋介石声明,在国共纠纷解决以前,美国将延缓对华提供大量经济援助。^⑨2月19日,周恩来在发送给毛泽东的电文中,将运用英、美、苏的外交列为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压力的首要方法,周恩来指出:“对顽固派以压的办法,运用外交(英、美、苏)、金融(外汇跌价)、经济(粮价、物价高涨)、地方(川、康、滇)各种关系压力。”^⑩周恩来的这一判断很可能是基于这一阶段中共对英美尤其是对美国宣传工作的效果显著。

二、中共外宣机构及跨国记者群体向美国新闻界传递信息的过程

为引导国内外舆论倾向,蒋介石于1月27日强调新四军受到军法制裁“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⑪同时国民政府加紧了对进步舆论的压制,阻挠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事变真相,桂林《救亡日报》于1941年2月被禁止出版。昆明、成都、贵阳、桂林等地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均被封闭。^⑫中共新闻通讯机构——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桂林总社、重庆分社被迫关闭,范长江、黄药眠等负责人转移到香港。不过,此时国新社香港分社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仍可以正常运转、沟通内外。^⑬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新社香港分社向国际中英文报刊发送新闻专稿。国新社香港分社一直与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合作紧密,该报在皖南事变前后连续转载国新社多份新闻稿件。1941年1月16日、17日《美洲华侨日报》发表国新社记者题为《政界耆

宿之时局谈,内部团结虽已日感严重,只要大家努力仍可好转”的采访专稿。值得注意的是,《美洲华侨日报》曾发表国新社特讯,报道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于1月12日上书蒋介石,指出事变的发生令“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呼吁蒋“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①以往研究一般认为宋、何、柳、彭的上书被国民党当局阻挠,此信暂未在香港和大后方公布,后由《新中华报》于2月9日发表。^②实际上,国新社香港分社与美国的及时联络使《美洲华侨日报》先于中国内地与香港,在1月29日发布了此信。1941年2月1日、2月3日,《美洲华侨日报》发表国新社香港分社提供的专稿《新四军事件发生后,敌加紧施加“以华制华”阴谋,香港报纸关心团结》。国新社在该稿中梳理了香港关于皖南事变的舆论。1941年2月3日、4日,《美洲华侨日报》发表国新社题为《已撤销番号宣传解散的新四军的过去与现在》的时评文章,国新社在文中介绍了新四军的成立经过、发展过程与分布状况。此外,国新社也给美国英文刊物供稿。例如,《今日中国》(*China Today*)于1941年4月发表了国新社的新闻,报道陈友仁对新四军事件的评论。陈友仁称“中央政府没有理由将新四军从长江转移”,“如果发生内战,美、英、苏对华援助也会自动停止”。^③

国新社香港分社还于1940年1月起出版发行英文刊物《远东通讯》(*Far East Bulletin*),主编为陈翰笙,副主编有贝特兰、恽逸群等。^④《远东通讯》的业务经理为邱茉莉(Elsie Fairfax-Cholmeley),她曾任太平洋国际学会刊物《太平洋事务》秘书,1939年与陈翰笙夫妇一起抵达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同时帮助建立工合国际委员会。^⑤事变发生后,陈翰笙立即将报道事件原委的《远东通讯》寄送给美国友人。在2月4日致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干事爱德华·卡特(Edward C. Carter)的信件中,陈翰笙提到他向卡特发送了报道新四军事件的2月1日第27期《远东通讯》。同时,陈翰笙嘱托卡特将该报转发给埃文斯·

卡尔逊将军(Evans Carlson)阅览。^⑥卡尔逊与罗斯福关系亲近,曾访问八路军、新四军部队。陈翰笙希望通过卡特与卡尔逊影响美国政府对皖南事变的看法。

事变发生前后,中共与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斯诺(Edgar Snow)等记者及时取得联系并向其提供新四军的相关材料。1940年12月,在事件爆发的前一个月,中共发布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要求党内对来访的英美记者“不仅不应采取不合理或冷淡之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待之以外宾之礼,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⑦据斯特朗回忆,在她1940年12月停留重庆期间,周恩来曾多次与她长谈,提供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历史与现状的相关材料。斯特朗于12月24日离开重庆,经香港返回美国前,周恩来告知斯特朗等待通知,暂不发表这些材料。^⑧周恩来的安排很可能是希望斯特朗积蓄力量,以在国共矛盾激化时握恰当时机,利用国际舆论对国民党进行反击。斯特朗在香港中转时接受了国新社香港分社的采访,她在采访中虽未发布新四军的详细材料,但是提醒英美政府,国共矛盾如果升级将影响英美利益:“中国团结问题如果向最坏的方面发展,无疑将便利了日本的南进,而使英、美遭受极大的不利,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战如果遭受挫折,就等于世界的民主政治受打击,中国团结问题的发展,已不仅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是与国际利害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了。”^⑨

斯诺回忆:“对于这次屠杀事件的详细情况,我比别的记者知道得早,是新四军的后方联络官廖承志告诉我的。”^⑩斯诺对新四军的发展历史较为了解,1938年他曾在汉口采访项英,^⑪并在之后发表题为《中国的新四军》的介绍文章。^⑫为争取对新四军的国际援助,1939年斯诺夫妇在旅居菲律宾期间与南洋多个华侨领袖联系募捐,计划为新四军建立“国际工合中心”。^⑬事变发生后,斯诺反应迅速,于1941年1月7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发表题为《随着国共分裂加剧,恐出现决裂》的

报道。他在开篇讲道：“各界人士深为忧虑：大规模之内战将于1941年初重新爆发。即使中共接纳国民党现在之要求，照现在之趋势，战事恐亦难以避免。”^②1月22日，斯诺继续在该报发表题为《经过在中国的九日作战，共产党击退了国民党军队，斯诺称国民党军队袭击了共产党军队，造成中共军队4000人伤亡》的文章。^③

2月，斯特朗收到中共通知，开始在美国发表一系列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④2月2日，斯特朗在《每日波士顿环球报》(Daily Boston Globe)发文称，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进攻导致新四军6000人伤亡，军长叶挺被俘。斯特朗认为事变可能是“国共内战的开端”，并影响“世界战争的平衡”。^⑤2月28日，她在《亚特兰大宪法报》(The Atlanta Constitution)发表《中国危机中的亲日阴谋受到指责》一文。在报道的开头，斯特朗称她收到了“来自香港的未经删减的资料”，并转引毛泽东1月20日的谈话，指出皖南事变是日本在订立日、德、意三国同盟后，为解决中日战争而策动中国内部变化的阴谋。斯特朗还提及了中共列举的日本和亲日派十五个步骤的阴谋计划，并强调冲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⑥事变发生时，斯特朗、斯诺皆不在中国内地，他们对新四军事件及时、有深度的报道使中共从国民党新闻封锁中“突围”出来，引起美国新闻界的关注。

三、中共对国际民间组织与美国华侨团体的舆论影响

皖南事变前后，太平洋国际学会、纽约中国人民之友社、保卫中国同盟与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在其刊物上持续为中共发声，这与中共长期以来对国际民间组织与华侨团体所做的国际统战工作有关。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成立于1925年，是由关心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组成的非政府学术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总部先后设立在檀香山和纽约，鼎盛时期该会在美国、加拿大、中国、苏联、日本等国设有14个分会。^⑦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笙、冀朝鼎先后进入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1933年，陈翰笙出

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会议。^⑧1936年，陈翰笙根据中共和苏联太平洋学会安排，协助欧文·拉铁摩尔办《太平洋事务》季刊，4月底陈翰笙夫妇与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干事卡特·爱德华、拉铁摩尔、邱茉莉等一同从伦敦前往纽约。^⑨1936年，冀朝鼎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1937-1940年，冀朝鼎担任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秘书处研究员。^⑩

陈翰笙、冀朝鼎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内广交朋友。拉铁摩尔曾回忆说：“我在中国会员里最亲密的朋友是陈翰笙和冀朝鼎。陈翰笙是中国太平洋关系学会书记处成员，1933年我在班夫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上首次见到他。我们马上觉得彼此意气相投……冀朝鼎是另一个有趣的人物。我知道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我没有理由相信他是中共党员。战后我被告知，他实际上是共产党员。”^⑪1941年，冀朝鼎通过孔祥熙与美国友人的关系，离美赴重庆出任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The American-British-Chinese Currency Stabilization Board)秘书长，在国民党内部开展中共地下党工作。^⑫在这一年初，冀朝鼎推荐曾任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书记的徐永煊应聘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员。^⑬徐永煊与冀朝鼎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就读期间他们与施滉等八人成立秘密团体“超桃”，1925年徐永煊赴美留学，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⑭

在陈翰笙、冀朝鼎、徐永煊的影响下，太平洋国际学会内部同情中共、支持中国抗战的会员逐渐增多。皖南事变发生后，太平洋国际学会持支持中共一方的态度。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分会刊物《远东观察》(Far Eastern Survey)在1941年的第1期与第2期发表了多萝西·博格(Dorothy Borg)关于皖南事变的两篇评论文章。^⑮博格在《中国的红军》一文的开篇写道：“统一战线出现裂痕的含义，只能根据国共过去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来判断。”^⑯博格详细阐释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术及其在对日战争中的战绩，并概述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治政策。此外，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处秘书凯

特·米切尔(Kate Mitchell)在1941年《今日中国》第2期与《美亚》杂志第2期同时发表题为《中国的政治危机》的评论,她在阐释事变发生原因时指出:“近日最新消息及私人报告均显示中国濒临极严重的政治危机,此危机实由重庆方面之一小撮握有实权的亲法西斯派所导致,他们努力对日投降清除道路。”^④再有,《美亚》第3期、第5期登载了汉斯·希伯(笔名亚细亚人, Asiaticus)撰写的《叶挺将军自传》和《中国的内部摩擦有助于日本》。^⑤汉斯·希伯为德国共产党员、太平洋国际学会成员。1939年他以太平洋国际学会《太平洋事务》记者的身份,与史沫特莱、杰克·贝尔登一道访问新四军军部,会见周恩来、叶挺、项英等中共领导人。^⑥

除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冀朝鼎曾在另一个国际民间组织——中国人民之友社(The Frie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表现活跃。1933年5月,冀朝鼎、美共同情者菲利普·贾菲以及其他几位美共党员在纽约成立了美国共产党中国局外围组织中国人民之友社。^⑦截至1936年,中国人民之友社在美国境内发展了纽约布鲁克林区分会、费城分会、旧金山分会、洛杉矶分会等分支机构,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等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相继成立。^⑧1934年10月,中国人民之友社的机关刊物《今日中国》创刊,冀朝鼎(笔名 Hansu Chan)、菲利普·贾菲、托马斯·毕生(Thomas Arthur Bisson, 笔名 Frederick Spencer)等担任主编。^⑨

事变发生后,菲利普·贾菲等八位中国人民之友社成员向蒋介石发送电文,呼吁中国团结。1月28日,《美洲华侨日报》翻译了该电文,内容如下:“蒋介石将军勋鉴:最近消息纷传攻击新四军及逮捕军长叶挺,美国人民对之极为关切。此种行动,只能对日有利,而损害中国在美之声誉。吾人深感恢复中国人民之团结,为制止亚洲极权国侵略之要图。”^⑩此外,为吸引美国民众对于事件的关注,《今日中国》2月与3月刊的杂志封面皆使用以新四军为主题的木版画。《今日中国》在1941年2-4月大量发表皖南事变的相关评论文章、新闻报道、历史文献与电文转

载。^⑪《美亚》是1937年3月冀朝鼎与菲利普·贾菲第二次联手创办的杂志。1937—1940年,冀朝鼎任《美亚》杂志主编,并开辟专栏“远东经济笔记”。^⑫皖南事变后,《美亚》不仅发表了以上提到的斯特朗、米切尔、汉斯·希伯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在1941年5月发表了巴尼特对周恩来的采访实录。^⑬

香港方面,1月19日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 简称“保盟”)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廖承志做关于皖南事变情况的报告。会后,保盟向英美等援华组织告知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⑭保盟是宋庆龄、廖承志、邓文钊等在香港筹划成立的国际民间组织。该组织成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招募医疗人员与募集物资。从争取国内外更多支持的统战角度出发,宋庆龄等邀请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担任保盟要职。1941年1月23日,保盟成员贝特兰(James Bertram)给美国援华会执行秘书米尔德里德·普莱斯(Mildred Price)致信指出:“此时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公众舆论应该被动员起来给重庆带来压力,以利于团结与继续抗战……我们已将皖南新四军事件的消息(1月6-13日)发送出去,并向英国的两位主要议员——艾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和埃莉诺·拉斯伯恩(Eleanor Rathbone)以及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China Campaign Committee)发信,敦促采取行动、抗议并要求释放囚犯。因此,在英国和中国,人们很可能会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希望您组织类似的事情。保盟的新年贺词清楚地阐明了我们自己的立场。”^⑮此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发表多篇关于皖南事变的评论文章,在2月15日发表的《统一战线继续存在》一文中,保盟指出:“新四军事件对于抗日统一战线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让这次事件成为对亲日派的教训、对中国爱国人士的警告,并且使国内外一切民主力量继续努力,使国内和国际的反侵略统一战线继续存在。”^⑯

上文提到,国新社香港分社与《美洲华侨日报》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美洲华侨日报》是在中共影响下,依靠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简称“纽约衣联

会”)创建的华侨报刊。抗战时期,纽约衣联会支持抗日救国活动与在美华侨反歧视、反剥削斗争,成为纽约华埠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⁵⁵1939年纽约衣联会提议,为“反映华侨舆论、客观报道祖国情况,特别是侨乡实况”,应该创办一份“华侨自己的报纸”。⁵⁶1940年7月8日,《美洲华侨日报》依靠纽约衣联会创刊,社长为中共党员唐明照,冀贡泉担任总编辑,该报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徐永煊。⁵⁷唐明照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1933年唐明照赴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留学,毕业后进入纽约衣联会担任英文干事,1939年任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书记。⁵⁸冀贡泉为冀朝鼎之父,早年留学日本,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38年经周恩来指示,冀贡泉、冀朝鼎携家人赴美国工作。⁵⁹在唐明照、冀贡泉、徐永煊的影响下,《美洲华侨日报》逐渐成为中共对美国华侨开展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纽约衣联会内部同情中共的成员也日益增多。

1月8日,全美洲洪门就国共矛盾问题致电两党,《美洲华侨日报》在1月10日发表了该电文内容。⁶⁰1月13日,《美洲华侨日报》发表社论《空前绝后的团结任务》,谴责国民党方面发动皖南事变,指出:“因为中国的内战,是要把中国弄到四分五裂,弄到抗战领袖身败名裂,弄到全国的民众破家荡产,弄到要走上卖国投降的道路的最有把握的敌人的武器。而事实上,抗战与内战势不能并存,分裂与投降必相为因果。如果有人说中国是可以一面反共,一面抗日的話,那不独是欺人之谈,实是准备投降的烟幕弹。”⁶¹1月15日,纽约衣联会在《美洲华侨日报》发表《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为促进团结抗战致国共两党领袖快邮代电》,指出“前方杀敌致果,即奋发勤捐输;闻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更奔走相庆;而闻走私贪污囤积敛财之消息,及党同伐异之传闻,则疾首蹙额,望祖国而长叹!殊意严惩贪污之令尚未见诸厉行,而调防移防之事,乃先成为问题”,呼吁国民党收回新四军调防令。⁶²1—3月,《美洲华侨日报》还发表了《事实胜于雄辩,胜利高于一切》《孙夫人上书请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所闻异词”的新四军事

件》《以血战杀敌,去呼吁团结》等多篇社论,并转载古巴华侨救国大同盟、美国费城华侨联合会、美南列珠文华侨救国会、美国加省华工合作会、致公堂驻墨西哥机构、纽约华侨青年救国团等美洲华侨团体致国共两党的电文,将华侨声援新四军的舆论推向高潮。⁶³

四、余论

随着中共对美国宣传工作的逐层展开,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后国共舆论话语权的争夺中逐步陷入被动。1941年1月30日,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在致外交部电文中提到:“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不仅 Carlson 一人也。故深盼部中将此事详情及本月初以来之经过,电告本馆,以便随时向美国朝野解释。”⁶⁴受制于事变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希望息事宁人,缓和国共关系,以确保美国政府顺利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蒋介石在2月22日的日记中指出:“共党对美国朝野之宣传已深,居里受其影响之深刻,已成不可救药之象,然不可再与之多论共党问题,反增其疑虑,只可暂时置之。”⁶⁵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国共双方激烈对抗的局面暂告一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对美国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促成中共进一步考量对英美政策的调整。上文提到,美国学者巴尼特(Robert Warren Barnett, 鲍华伦)在重庆对周恩来就皖南事变的相关问题进行采访。巴尼特为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rthur Doak Barnett)之兄,⁶⁶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表现活跃,1951年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列为美国国务院内同情共产党的重点调查对象。⁶⁷在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之时,周恩来向巴尼特阐述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分裂行为,表明中共代表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具体原因,并表达了中共对美国态度的转变。巴尼特提问:“我在重庆的时候,有人反复说中国共产党人反对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支持,因为这样的支持可能被用于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人是否需要美国的援助?”周恩来回答:“我们期盼任何能加强中

国抗战的力量。我们担心这种援助可能被用来发动对我们的攻击,但如果美国的援助是为了支持我们的抗日战争,我们欢迎这种援助。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援助并不满意。美国应该结束与日本的所有经济关系。这样的做法比美国能做的任何事情都更有效。到目前为止,日本从美国获得的援助远远超过中国。”巴尼特追问:“中国人是否会美国这种活动感到忧虑,因为这可能导致美国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渗透?”周恩来回复:“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支持是由美国人民、富有同情心的媒体和一个友好的政府支持的,中国就没有恐惧。帝国主义涉及军事和经济压迫。忠告和帮助不是帝国主义。”在谈到与居里会面情况时,周恩来表示,居里是一个“热衷于了解事实”的人。^⑥

此外,事变后周恩来曾安排南方局外事组王炳南、王安娜、龚澎拜访重庆的外国记者与外交官,王安娜促成了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与周恩来的私人会谈。^⑦5月,周恩来会见美国作家海明威夫妇与鲁斯夫妇,他们表示支持中国实现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不满国民党的抗战不力。^⑧5月16日,周恩来致电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并报毛泽东提到:“根据海明威等所谈,我们在外交上‘大有活动余地’。建议在香港多选几个人,‘配合这种活动,活动方针须与重庆合拍’。”^⑨周恩来希望重庆、香港与美国之间的中共国际统战网络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充分发挥以国际统一战线推动国内统一战线的作用。一方面,皖南事变后中共化危为机,其对美国的宣传工作使中共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形象在美国政府与民众的视野中得以强化;另一方面,中共认识到在外交上,尤其是中共对英美外交上“大有活动余地”。

综上,皖南事变后中共以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基地,形成了在港跨国记者、保卫中国同盟、国新社香港分社为主体的香港宣传群体,同时在美国构建了中国人民之友社、太平洋国际学会、纽约衣联会等为核心的美国宣传群体。重庆、香港与美国的宣传群体之所以能达成高效合作,与旅美中国共产

党人开展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相关。例如,冀朝鼎曾在多个国际民间组织与报刊媒体如太平洋国际学会、《今日中国》、《美亚》、美国援华会表现活跃;陈翰笙也曾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保卫中国同盟、工合国际委员会等多个国际民间组织的工作。如此,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宣传网络在重庆、香港与美国三地不断缠结与联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这更加坚定了中共联合英美共同反对法西斯的决心。12月9日,中共提出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⑩1942年1月,美、英、苏、中为核心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此后,不仅中共进一步扩大与英美民间组织的交往,积极争取美国政府派遣观察组进入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也期待在对日作战中获得中共的帮助。1944年,在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以及华莱士访华后,国民党终于同意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由此开启了中共与美国政府正式接触与合作的历史。^⑪

注释:

①相关研究如何迪、曹建林、翟卫华《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中争取国际舆论的斗争》,《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期;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贾钦涵:《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与居里会谈述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2期;等等。文献资料如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2015,等等。

②《刘少奇关于建议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暂不反攻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13页。

③《刘少奇关于建议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暂不反攻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1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14页。

④《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取消新四军番号后形势与对策的报告》(1941年1月18日),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⑤《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1941年1月1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16页。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1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43页。

⑦任弼时:《皖南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形势》(1941年2月1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113页。

⑧《毛泽东等关于当前时局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41年2月1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127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503页。

⑩《周恩来等关于政治上全面进攻军事上局部反攻给毛泽东等的电报》(1941年2月1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130页。

⑪《蒋介石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讲话》,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第412页。

⑫《生活书店史稿》编委会编《生活书店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371页。

⑬1938年,周恩来指示胡愈之和范长江筹建一个中共领导的外宣机构。10月,国际新闻社在长沙成立,刘尊棋、范长江、孟秋江等为负责人。国新社以中共党员为核心,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为骨干,设立桂林总社以及重庆、香港两个分社。国新社香港分社负责人为中共党员恽逸群。参见黄药眠《“国新社”在桂林》,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国际新闻社回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82页;陆炳炎主编《恽逸群同志纪念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126页。

⑭《孙夫人柳亚子等上书蒋总裁,吁请力行国策撤销剿共部署》(国新社特讯),《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1月29日,第2页。

⑮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693页。

⑯Kuusin Agency, "No Reason For Shift, Says Eugene Chen," China Today, 1941. 3.

⑰《远东通讯》通信地址为“P. O. BOX1629, Kowloon, HongKong”,美国胡佛档案馆藏有1940年1月到10月的《远东通

讯》。

⑱何大章、陈红军主编《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往来书信(1941-1981)》,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第10页。

⑲Chen Han-seng to Mr. Edward C. Carter, 1941. 2.4, Philip J. Jaffe Papers, Box 46, Folder 1, Stuart A. Rose Manuscript, Archives and Rare Book Library, Emory University.

⑳《中央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1940年12月25日),转引自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第81页。

㉑[美]斯特朗:《我在中国的经历》,《人民日报》1980年3月27日。

㉒国新社1月8日发布对斯特朗采访的内容,1月22日《美洲华侨日报》转载。《美名作家谈中国团结欲避免分裂必须实现民主政治(史特朗女士访问记 国新社一月八号)》,《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1月22日,第2页。

㉓[美]斯诺:《斯诺文集》第1卷《复始之旅》,宋久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第288页。

㉔武际良:《报春燕——埃德加·斯诺》,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5,第484页。

㉕该文首次发表于《亚细亚》杂志,1939年5月上海出版的《华美》杂志第2卷第7期发表其中译版,后斯诺将其收入《为亚洲而战》于1941年发表。《新四军·参考资料》(1),第24页。

㉖Edgar Snow to Ida Pruitt, 1939. 3. 6, Edgar Parks Snow (1905-1972) Papers,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㉗Edgar Snow, "Break is Feared as Chiang-Reds Split Deepen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1941. 1.7, p. 7.

㉘Edgar Snow, "Reds Fought off Chiang Troops 9 Days in China, Snow Says Chunking Army Attacked Communists Killed or Hurt 4000,"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1941. 1. 22, p. 7. 此外,3月,斯诺将曾经发表的《中国的新四军》改题为《人民的军队》,在《今日中国》再次发表。Edgar Snow, "A People's Army," China Today, 1941. 3, pp. 9-10.

㉙[美]斯特朗:《我在中国的经历》,《人民日报》1980年3月27日。

㉚Anna Louise Strong, "F. D. Envoy to China Seen Holding Balance in Civil War Issue," Daily Boston Globe, 1941. 2. 2, p. B16.

㉛Anna Louise Strong, "Pro-Japanese Plot is Blamed in China Crisis," The Atlanta Constitution, 1941. 2. 28, p. 38.1941年3

月,斯特朗还在《美亚》杂志发表评论《中国的国共危机》。Anna Louise Strong,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Crisis in China," *Amerasia*, 1941. 3.

⑳ 欧阳军喜:《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简史》,《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8期。

㉑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58—159页。

㉒ 《陈翰笙同志谈〈地下工作二十五年〉》,张椿年、陆国俊主编《陈翰笙百岁华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92—293页。

㉓ Howard L.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ume I(1): AI-Ch'U,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67, p. 295. 该书的冀朝鼎生平简介由贾菲提供并订正,详见 Boorman Biography of Chi, Philip J. Jaffe papers, Box 5, Folder 3, Stuart A. Rose Manuscript, Archives, and Rare Book Library, Emory University。

㉔ [日] 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第34—35页。

㉕ Howard L.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ume I(1): AI-Ch'U, p. 295.

㉖ 徐庆来:《徐永煥纪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139页。

㉗ 徐庆来:《徐永煥纪年》,第46、378—381页。

㉘ D. B., "Break in United Front?" *Far Eastern Survey*, 1941.1.29, p. 2; Dorothy Borg, "China's 'Red' Armies," *Far Eastern Survey*, 1941. 2. 12, pp. 22-23.

㉙ Dorothy Borg, "China's 'Red' Armies," *Far Eastern Survey*, 1941. 2. 12, pp. 22-23.

㉚ Kate Mitchell, "Political Crisis in China," *China Today*, 1941.2, pp. 5-6; Kate Mitchell, "Political Crisis in China," *Amerasia*, 1941. 2.

㉛ Asiaticus, "Autobiography of General Yeh Ting," *Amerasia*, 1941. 3, pp. 24-29; Asiaticus, "China Internal Friction Aids Japan," *Amerasia*, 1941. 5, pp. 118-122.

㉜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统战与国际友人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第297页。

㉝ 1935年5月,组织的英文名改为The American Frie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但是笔者发现《美洲华侨日报》等报纸仍将组织译为“中国人民之友社”,因此本文对该组织的中文译

名统一为“中国人民之友社”。

㉞ 刘小莉:《史沫特莱与中国左翼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108—109页。

㉟ "One Year of 'China Today'," *China Today*, 1935. 10, p. 2.

㊱ 《中国人民之友社电促中国团结》,《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1月28日,第7页。

㊲ 评论文章如上文提到的凯特·米切尔的《中国的政治危机》、斯诺的《人民的军队》等(Kate Mitchell, "Political Crisis in China," *China Today*, 1941. 2, pp. 5-6; Max Granich, "China's Inner Conflict—An Analysis," *China Today*, 1941. 3, pp. 5-6; Edgar Snow, "A People's Army," *China Today*, 1941. 3, pp. 9-10); 新闻报道如2月刊发表的《国家团结的裂痕》等("The Crack at National Unity," *China Today*, 1941. 2, pp. 3-4; "The K. M. T. Unleashes Its Terror," *China Today*, 1941. 4, p. 3; "Attack on New Fourth Planned Massacre by Central Government; Nurses and Wounded Fight Until Munitions Are Exhsusted," *China Today*, 1941. 3, p. 18); 历史文献如《为团结而战的记录》《“退让阶段结束……”国共危机文献(节选)》等["A Record of the Fight for Unity," *China Today*, 1941. 2, pp. 10-12; "The Stage of Concession is Over..." Documents on Kuomintang-Communist Crisis (condensed), *China Today*, 1941.3, pp. 7-8]; 电文转载如《致蒋介石的电报与日俱增,赞扬过去的团结,抗议目前的分裂,揭示日本的获利》《孙中山夫人向蒋介石呼吁》等("Cables to Chiang Kai-shek Increase—Praise Past Unity, Protest Break, Show Japanese Gains," *China Today*, 1941. 3, p. 2; "MME. SUN YAT-SEN Appeals to Chiang Kai-shek," *China Today*, 1941. 3, p. 16; "Cabled Demands for Unity Continue," *China Today*, 1941. 4, p. 2)。

㊳ Howard L.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ume I(1): AI-Ch'U, p. 295.

㊴ Kate Mitchell, "Political Crisis in China," *Amerasia*, 1941. 2; Anna Louise Strong,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Crisis in China," *Amerasia*, 1941. 3; Asiaticus, "Autobiography of General Yeh Ting," *Amerasia*, 1941. 3, pp. 24-29; Asiaticus, "China Internal Friction Aids Japan," *Amerasia*, 1941. 5, pp. 118-122; Robert W. Barnett, "An Interview with Chou En-lai," *Amerasia*, 1941. 5, pp. 123-127.

㊵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第695页。

㊶ Jim Bertram to Mildred Price, 1941. 1. 23, INDUSCO, Inc., Records, China Aid Council, Box 161,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⑤④《统一战线继续存在》(1941年2月15日)、《中国内地一位通讯员的公开信》(1941年4月1日),中国福利会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中),吴景平译,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第283、301—307页。

⑤⑤于仁秋:《救国自救——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简史(1933—1950's)》,香港,三联书店,2003,第99页。

⑤⑥于仁秋:《救国自救——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简史(1933—1950's)》,第116页。

⑤⑦当日的发刊词表明了该报的办报方针:“一、国内之重要事件,尽量介绍于侨胞之前,以便侨胞人人熟悉国事。二、侨胞之重要事件,尽量传达于国内各界,以期国内处处注意侨胞。三、侨胞各地发生之事,广为搜集披露,以增进其交相了解,彼此互助之机会。四、侨胞自身有关之事,详加研讨发表,以消除其当境烦杂,疑而无告之痛苦。五、促成国内宪政,巩固华侨参与国政的地位。”《发刊词》,《美洲华侨日报》1940年7月8日,第1页。

⑤⑧《广东省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1979—2000)》第32卷,方志出版社,2014,第361页。

⑤⑨冀朝铸:《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第8页。冀朝铸为冀贡泉之子、冀朝鼎之弟。

⑥⑩《全美洲洪门总干部致国共两党调解纠纷电文》,《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1月10日,第2页。

⑥⑪《空前绝后的团结任务》(社论),《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1月13日,第1页。

⑥⑫《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为促进团结抗战致国共两党领袖快邮代电》,《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1月15日,第2页。

⑥⑬《事实胜于雄辩,胜利高于一切》(社论),《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1月14日,第1页;《孙夫人上书请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社论),《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1月31日,第1页;《“听闻异词”的新四军事件》,《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2月21日第1页、2月22日第1页、2月24日第1页;《以血战杀敌,去呼吁团结》,《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3月5日,第1页。转载电文如《古巴华侨救国大同盟呼吁团结》,《美洲华侨日报》

1941年1月11日,第8页;《列珠文抗日会电请国共坚持团结》,《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1月27日,第8页;《费城华侨飞邮代电呼吁团结抗战到底》,《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1月27日,第8页;《墨国参埠致公堂通电蒋毛呼吁团结御侮》,《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1月28日,第8页;《加省华工合作会通电促进团结抗战》,《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1月29日,第8页;《青年救国团呼吁团结抗日》,《美洲华侨日报》1941年1月30日,第8页。

⑥⑭《胡适致外交部电》(1941年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第93页。Carlson即前文提到的埃文斯·卡尔逊将军。

⑥⑮转引自贾钦涵《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与居里会谈述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⑥⑯李增田:《鲍大可及其中国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第10页。

⑥⑰Major Speeches and Debates of Senator Joe McCarthy, Deliv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1950—1951,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 C., p. 319.

⑥⑱Robert W. Barnett, "An interview with Chou En-lai," *Amerasia*, 1941. 5, pp. 126, 127.

⑥⑲[德]王安娜(Anna Wang):《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第360—361页。

⑦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89—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第514页。

⑦⑪《周恩来年谱(1889—1949)》(下),第514页。

⑦⑫《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1941年12月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732页。

⑦⑬详见《戴维斯致居里备忘录》(1942年8月6日)、《庄莱德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1943年1月20日)、《罗斯福致蒋介石》(1944年2月10日)、《罗斯福致蒋介石》(1944年3月1日)、《中缅印战区指挥部致包瑞德令》(1944年7月21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8卷(下),中华书局,2015,第981—992页。